



首档乡村公益节目《第一书记》新版首播

贫困村第一书记非诚勿扰“牵手”

天下大观

本报记者 蒋肖斌

从立门村到宁明县要坐1个多小时的汽车，从宁明县到南宁市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2个小时，从南宁到北京要坐3个小时的飞机，从首都国际机场到位于北京丰台区的《第一书记》录制地点还有40公里车程……日前，国家级贫困村、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宁明县寨安乡立门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以下简称“第一书记”）张杨，就这么来到了广西卫视中国首档美丽乡村公益节目《第一书记》的录制现场。

没有化妆，没有台本，穿着平常衣服的张杨，是带着全村2028人的希望来的。他要在这档电视节目中推销村子里正在进行的脱贫项目，希望节目现场的企业家能与他“牵手”成功。张杨并不是第一个上电视的“第一书记”，该栏目从2014年2月开始至今，已经有70多名国家级贫困村的“第一书记”陆续“抛头露面”，充当村子的推销员。从今年7月起，节目全新改版，他们将走出广西，来到北京。如此“高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汽车能开到的村子，需求还不那么迫切

《第一书记》制片人梁家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节目由来是广西的“第一书记”政策。从2012年起，广西选派了3000名机关干部到广西最贫困的3000个村庄，担任村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任期两年。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让村子尽快富起来。广西电视台恰好也选派了3个“第一书记”。他们下村后发现，村子的需求各不相同，而社会的帮助力量其实也非常强大，缺乏的是两者之间的沟通。于是，一档专为贫困村和社会力量服务的公益节目“非诚勿扰”诞生了。

节目的形式可说十分简单：“第一书记”带着当地的扶贫项目来到节目现场演讲，然后播放一段节目组在当地拍摄的VCR，再由现场的爱心人士——或者称为“boss团”，提出发展意见或者直接进行捐助。

然而，节目背后的制作过程却着实不简单。梁家鸿说：“我们内部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凡是车能开到的村子，都还不足以进入节目的视野范围，因为在大山里面有更多需要帮助的村民。”于是，这个平均年



第一书记张杨(右)与村支书介绍产业

龄不到30岁的团队，由“最老”的80后梁家鸿带队，因为不通车，只能肩扛手提着摄像机翻山越岭进村，经常早上8点出发，花一个半小时翻越一座山，再花一个半小时翻越又一座山，11点到村子，拍摄完，再翻出来。

就这样，截至2014年年底，《第一书记》节目组翻山越岭，累计13.14万个小时，行程17.52万公里，走访了50多个国家级贫困村。现在，拍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广西的“第一书记”，贵州、四川、湖北、云南等地的贫困村村官，只要有脱贫项目，都有可能上节目。

梁家鸿介绍，《第一书记》第一是办给农村观众看的，可以给他们一个脱贫致富的参考；第二是办给社会爱心人士看的。梁家鸿回忆，节目刚开始在广西录制的时候，每场要求100个不重复的企业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3个月后有节目有了知名度，100个名额还供不应求。“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广西资源毕竟有限，我们想要提升，所以今年7月来到北京录制，每期请10个左右北京的企业家来现场指导。”梁家鸿说。

是真人，不是秀。拎着鸡蛋、蘑菇就上电视

关注乡村非遗保护的刘焯熹是《第一书记》的忠实观众，每期必看。“且不说节目本身如何，至少它扶持村民创业，农村最弱势群体的人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这很好。”

梁家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尽管我们会给书记总结一些标签，像‘警官书记’、‘老师书记’、‘蘑菇书记’……但我们的节

目是‘真人’，不是‘秀’。说人话、做人事，是我们选人的标准。”

于是，在节目中，经常能看到“第一书记”们拎着篮子鸡蛋、拿着几捧蘑菇、端着一盘现烧的当地特产“鸭嘴鱼”，就上了台。这不是演习，没有台词，没有彩排，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一个都在镜头前侃侃而谈。“这本来就是每天在我脑子里过的事儿。”张杨说。

“第一书记”的年龄一般在30-50岁之间。这次在北京参加录制的“第一书记”张杨，大概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201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今年只有28岁。张杨从小在北方城市长大，却一毕业就志愿来到广西，在南宁没工作两年，又主动申请下了村。

尽管是“第一书记”，张杨仍然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年轻人，用着iPhone6手机。他有些腼腆地说：“一直想买一款苹果手机，但舍不得买。后来手机摔烂了，媳妇攒钱送了我一个当生日礼物。”不过，只要一说到立门村的事儿，他立刻成了最称职的推销员。

“我们村有2028人，515户。我们村是边境村，村委会距离中越边境线不到两公里。我们村有一个北山边贸互市点，享有从越南进口木薯片的税收优惠。今年1月，离我们不到40公里的宁明县爱店口岸升级为国家级互市点，这对我们村是很大的发展机遇，我们的互市点（我国边境地区居民和对方国边民可进入互市贸易区/点从事互市贸易——记者注）也将相应地增加进口商品种类、扩大进口规模……”张杨滔滔不绝。



《第一书记》摄制组在贫困村拍摄

张杨说：“我上电视没有任何顾虑，在这个位置就要多做事。村民觉得我是名校大学生，什么都懂，其实我也是从头开始。”相比于大多数村子靠发展特色农业致富，张杨想得更多。“我们正在筹建一个边贸合作社，希望逐步将村民从提供边贸劳务服务的搬运工，变成互市贸易的主体。同时合作社还准备打造一个货物转运站，建成后将成为集仓储、运输、饮食、住宿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边贸服务平台。但由于是山区，涉及推山填沟的大工程，希望能得到社会力量的帮助，不仅是资金投入，还希望指导我们如何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合作社。”

立门村的村民们也没有“等、靠、要”，他们自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已经有100多名村民入股，筹了100多万元。“将来合作社如果盈利了，就可以赡养村里的孤寡老人、给大学生交学费……”要上台了，采访不得不结束，张杨恋恋不舍地说：“我还有很多没说呢，等我录完咱们再聊。”

近年往返于纽约与北京的女作家查建英也来到书展。此次书展的讲座，由她北大同窗兼好友、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子平主持。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和《弄潮儿》两部新作近年来引起较大反响。“跨境、跨地域写作的优势和陷阱”成为她演讲的主题。

她笑言，这个题目不如余秀华、廖伟棠对谈的题目“漫谈，乱谈”灵活。查建英说，辗转世界各地，进行双语写作，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纠结、充满了怀疑”。

此外，谢海盟、张怡微等两岸80后女作家也受邀参加本届香港书展。来自台湾的谢海盟是知名小说家朱天文与文学评论家唐晓芸的女儿，曾为侯孝贤新作《刺客聂隐娘》担任编剧。同为85后的张怡微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脱颖而出，在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后，目前正在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她表示，许多文学养分来自于两岸互通，文学正是这种互通的鹊桥。

“开始我担心两个小时我们打受不了，后来发现我们可以聊20个小时。”

这并非余秀华第一次来香港，此前她曾受邀来港录制节目。她说，“真正的行走是一个人，不会有这么多人来看我。这是表演，不是行走。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会一个人去那些人少的地方。香港人太多，我怕我走丢了。”

余秀华以她的朴素、幽默，应对化解了外界的各种质疑。7月17日上午，余秀华在儿子的陪伴下，到隔壁会议室聆听三获鲁迅文学奖的女作家迟子建的主题演讲“文学的山河——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群山之巅》”。迟子建表示：“余秀华来听我的演讲，真有点激动。我一直很想认识你！很想听你的讲座呢。”迟子建还向香港读者推介余秀华：“她是我们内地很有名的诗人，很多人读过她的诗。”

7月17日，在与陈若曦、王跃文、季季和九夜茴等两岸三地作家同台参加“名作家朗诵会”时，余秀华被第一个请

女作家、女诗人成香港书展亮点 草根诗人余秀华：生命恐慌一直存在



本报记者 张彦武

7月21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为期一周的第2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圆满闭幕。香港贸易发展局副局长周启良透露，由该局委托独立调查机构对800名参观者的抽样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表示会在书展现场购买小说作品，受访者购书的平均消费为903港币。“读者参与了超过360场文化活动。不少活动，如李欧梵、侯孝贤、林夕等人的讲座，都是座无虚席。香港书展已成为促进多方文化交流的盛事。”他说。

记者了解到，本届香港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一读钟情”为主题，吸引了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80家参展商。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主办的“名作家讲座系列”是最吸引读者的重头活动。记者注意到，此次受邀参加“名作家讲座系列”的女作家比重大，并成为书展中当仁不让的主角。

去年底，因诗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意外走红的湖北农村诗人余秀华，被请来参加本届香港书展。主办方为其安排了高规格的记者招待会及与香港本地的现代派诗人廖伟棠的对谈，其诗集的繁体中文版最近也在香港出版。

余秀华是7月16日在读大一的90后儿子陪伴下飞抵香港的。行前一天，她在微信朋友圈上感慨：“想到去香港要见廖伟棠，我怎么这么紧张？我能不能瞎谈，带他入会啊？反正明天又是照鱼渠的。”对话结束后，她又如释重负，称

上台，她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7月20日，余秀华在与廖伟棠的题为“漫谈，乱谈”的对谈中直言：“诗歌的本质是心灵的舒适。我只是把我这个人完全地体现在诗歌里。你看到了，懂，是我的幸运，不懂，也没关系。”

去年，《诗刊》编辑刘年在该杂志的微信公众号，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最早推荐了余秀华。她遂将这位伯乐引为知己。“是他发现我的诗。我和他的交往是因为诗歌之外的共鸣——他理解我这个人，会在我被非议时无条件地相信我。有时候我被别人骂得不知所措时，就会去找他说一说，请他安慰我的心灵。”

余秀华称，云南诗人雷平阳是对她影响最大的国内诗人。她坦言：“读别人的诗歌，往往在别人的诗歌里找灵感。写诗歌，技巧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形容词和动词，反复颠倒使用。”她说，读别人

的诗，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狭窄，好多意象看不到。‘哦，世界上还有这个东西存在’。”

廖伟棠同情余秀华一夜成名后的四处巡回签售，余秀华却并不认同。“到处行走并不代表说你突围了，真正的突围应该是心灵突围。相反，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诗歌写得少了，第一是因为懒惰，第二真的很少有触动我的东西、触动我的人、触动我的景。”

“任何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满足。像那次很残酷不全的生命——特别是从那次自杀之后——我一直觉得活一天是赚一天，活着的日子都是赚来的日子。我不亏。”她说，诗歌一下子带我走了这么远，把我捧得这么高，我担惊受怕，内心恐慌。我写不写诗歌，生命里的恐慌和受伤都一直在。”

在对谈现场，余秀华在廖伟棠的鼓励下，现场朗诵了她书展期间刚刚即兴创作的一首短诗《我们牵手走一走，然后放开》。

编剧不死，原创仍是最好的IP

——访《冰与火的青春》编剧梁振华

文化现场

本报记者 蒋肖斌

自7月12日晚在湖南卫视开播后，青春励志剧《冰与火的青春》连续5天位居省级卫视黄金剧场电视剧的收视率榜首，网络点击率3天即累计破亿。在“无望胎不青春”的怪现状下，该剧却难得没有落入“堕胎、出国、死亡”这青春偶像剧“三大法宝”的窠臼。近日，该剧编剧兼制片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梁振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我用‘冰与火’来为青春命名，不光因为这是剧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更因为这是青春的两种情绪——不断跌倒、不断爬起。”在剧中，梁振华写了三个男生。

“富二代”江淼接连遭遇破产、父亲入狱、母亲病倒的打击，但最终凭借自己的能力重新站了起来；胸无大志的肖一飞视爱情为一切，但在爱情破灭后迷失了方向；“凤凰男”苏克有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最终去开发廉租房项目。

梁振华说：“三个人是三种性格、三种理想。他们身上的标签，在现实中都是社会的热议话题，比如‘富二代’是否有原罪，‘凤凰男’是不是不能嫁。但剧中的主人公最后都形成了正向的价值，青春没有一味地迷茫、堕落、混乱。”

梁振华坦言，中国占据电视荧幕的主流是家庭伦理剧、战争剧、古装剧等类型，一定程度上，青春偶像剧是日韩舶来品。“然而，复制日韩模式，留给中国观众的只剩下漂亮面容、时尚服饰、都市生活。这些词语本身没有褒贬，问题在于

它仅仅把偶像变成了消费价值的消费品，而真正与青春、与中国当下现实的关联十分薄弱，青春偶像剧就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一部原创的青春偶像剧的原因。”梁振华说。

如果说韩国偶像剧，类似《来自星星的你》《继承者们》描写的是贵族生活，那么《冰与火的青春》更贴近现实。身为高校教师，梁振华笔下的人物几乎都能在校园中找到群体原型，“考试、答辩、求职，这些不是我在家拍脑袋就能写出来的，而是我多年对青年群体近距离观察的结晶”。而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经典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相比，时代已然变了。

梁振华说：“每一代人青春的内涵和外延都不一样。总体来说，80后的青春压

节目不是“一锤子买卖”，村子有进步，就看到希望

梁家鸿认为，对那些没上电视的“第一书记”来说，节目第一是借鉴，第二是监督。“隔壁村的‘第一书记’这么有作为，我也不能懒政。”

梁家鸿坦言，节目最初也遇到过怀疑：“有一部分人有顾虑，觉得电视扶贫会不会有‘高级黑’的嫌疑——居然还有那么多贫困村，村民过着那么苦的生活。我们就给他们做工作：为什么要派驻‘第一书记’，就是因为穷啊，有因才有果，而且节目也在客观报道扶贫工作已取得的成果。最终目的在于展现第一书记实实在在的在作出的贡献，动员全社会力量帮扶。一名县委书记看了录制后，感叹‘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回避贫穷’。”

《第一书记》并不是“一锤子买卖”，节目组会对村子做回访。开播一年半来，他们得到了来自广西各地的不少好消息，花1期节目的南宁市马山县古寨瑶族加显村“第一书记”庞雪，她寻求帮助的山银花项目已经得到爱心企业的帮助，山银花基地正在建设；第3期节目的贺州市昭平县仙回瑶乡茅坪村“第一书记”黄红熙，她带来的甜茶项目已由清华大学广西总裁班负责投资；第39期来宾市忻城县遂意乡弄尧村“第一书记”吴大平、黄维春，得到邮政储蓄广西分行的贷款和爱心企业捐款，用于当地发展黑山羊养殖……

《第一书记》每周五晚播出，这是全国卫视必抢的黄金档。梁家鸿坦言：“没有明星，没有娱乐，节目的收视率仍能稳定在中等，不能说很好，但一定会做下去。扶贫是很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时间内就彻底脱贫致富变成小岗村。但只要和上节目的时候相比，村子有进步，就看到希望。”

7月17日，“广西扶贫创业产业发展联盟模式推介会”在南宁举办，这是广西百色市德保县敬德镇雅里村“第一书记”沈民选参加《第一书记》节目后创办的，得到了300多家企业的响应。现在，作为联盟试点的德保黑猪项目已经启动，将带动当地500家农户、2000多人脱贫致富。这个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小伙儿“野心勃勃”：“1年内，将形成产业链企业的生态圈；2年内，把生态圈形成模式和管理体系，开始往其他城市推广；5年内，广西范围内形成联盟。”

《第一书记》节目的希望、“第一书记”们的希望、村子的希望，大概就在这里。

蔚观一周



林蔚

真人秀要“去明星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日前发布了《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对相关节目提出了多个详尽要求。广电总局方面认为，大多数真人秀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但一些节目有意无意没意义，要抵制此类节目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通知提出6条要求，包括防止把节目办成脱离群众的无聊游戏；引进节目应避免集中于某一区域，要充分进行本土化改造；关注普通群众，避免过度明星化；不可将节目办成拼明星和炫富的场所等。

点评：当收视成为第一标准时，坚持以普通观众为中心，传播中华美学等等就自然而然变成了响亮的口号。

《大圣归来》逆袭

一部事先不被看好的动画电影，首日票房仅1800多万元，《大圣归来》一度被归类为“暑期一周游”国产动画片。观众们的口碑相传，《大圣》的排片和票房双双逆袭上扬，上映10天后一举拿下5亿多元的票房，超越《超能陆战队》和《哆啦A梦：伴我同行》，成为2015年国内动画电影票房冠军。有观众评论称，《大圣归来》不低俗、不低智、不糊弄，适合全家人一起笑着看完。还有业内人士表示，只要前期有充足的投入，中国公司一样能制造出好莱坞动画大片同等质量的画面。

点评：主打低幼市场的国产动画片终于找到了新方向。但要战胜国外动画大片，还来日方长。

“点染紫禁城”受热捧

故宫官微日前发布特别互动内容，称鉴于近日填色游戏颇受欢迎，官微将故宫建筑彩画样也拿出来，让网友发挥艺术细胞进行涂色。配图故宫内藻井、房梁等建筑样式的图片及黑白线稿。这个名为“点染紫禁城”的活动受到热烈欢迎，网友们不仅积极参与，还纷纷要求故宫方面出版填色书。故宫方面表示，建筑彩画是故宫一直希望推广的文化内容之一，此次通过黑白线稿填色活动与网友互动，既希望拉近与网友的距离，也意在普及有关故宫建筑的知识。

点评：一个超赞的主意。期盼多一些接地气的文化活动，让高大上的博物馆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央视动画被判侵权

杭州大头儿子公司早前将央视动画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称其于2013年推出的《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侵害了大头儿子公司对该美术作品享有的著作权。法院方面日前裁定，央视动画侵权事实成立，判令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6万元。据悉，国产动画片经典《大头儿子》制作于1995年，人物设计为刘泽洋。2012年，杭州大头儿子公司购得人物版权。法院方面表示，央视动画虽侵权，但考虑到《新大头儿子》良好的社会效益，如判决停止播放，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故以提高赔偿额的方式作为停止侵权行为的方式。

点评：在侵权纠纷层出不穷，甚至侵权者还闹哄哄高调亮相的年代，这个判决是个很好的警示。

作者，既不会“玛丽苏”、“杰克苏”，也不会“霸道总裁”加“壁咚”，对于网络文学IP（网络文学版权——记者注）的创作理念也很陌生。

2015年，网络文学界最新、最热的词之一当属IP（Intellectual Property），直译是“知识产权”。原为资本界的术语，在互联网公司大举进入电影业的背景下，IP也成了热词。近年来热播的《失恋33天》《甄嬛传》《杉杉来了》《何以笙箫默》等影视剧，都源自网络小说。甚至有说法，IP时代来了，还要编剧干什么？

梁振华解释，其实IP一直存在，四大名著、金庸小说都是IP，只是称谓不同。“不可否认，现成的IP先天附着大量的关注者的粉丝，对项目营销有好处。”梁振华说，“但一个好的IP不一定能转化成好的剧本，之间的距离有可能是无限远。所有影视公司都在囤积IP，即便是有价值的IP，最终转化成影视作品的概率不到百分之一。”

《冰与火的青春》的剧本完全原创。梁振华自信地说：“最好的IP是原创力。编剧把人物、情节、主题夯实了，剧本本身不就是一个IP了吗？这时再说起‘冰与火’，就不会仅仅想到《冰与火之歌》，也会想起我的《冰与火的青春》。”